

论苏颋的诏敕创作

阮 爱 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之一,其诏敕作品与张说合称“燕许大手笔”。在张说的诏敕作品几近佚失的情况下,今人要想窥见“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的诏敕作品中一探究竟了。本文综合梳理了苏颋的210多篇诏敕以后发现,他执笔的诏敕骈散间用、融散入骈,用典的时候以熟典为主,骈对的形式和句法多变,同时以雄健的笔法展示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总的来说,苏颋的诏敕创作笔法雄健、气度雍容、辞藻壮美、格局明朗,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和诗风劈出一条新路。在诗歌领域“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苏颋的诏敕创作已经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导夫先路。

关键词:燕许大手笔;苏颋;诏敕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1-0047-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106

苏颋(670-727),字廷硕,京兆武功人,唐中宗朝宰相苏瑰之子。苏颋自幼聪颖,举进士,授乌程尉,累迁监察御史。中宗神龙二年拜中书舍人,专掌制诰。开元元年授工部侍郎,迁中书侍郎,袭父爵许国公。开元四年入相,四年后罢为礼部尚书,转益州长史。开元十三年随唐玄宗封禅泰山,十五年病逝。苏颋的文名与张说并称,《新唐书·苏颋传》云:“(颋)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1]卷125,14册,4402

“大手笔”一词,首见于《晋书·王导附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尔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王珣所说的“大手笔”,是用“如椽”的“大笔”写成的“哀册谥议”,即封建国家在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合中使用的文书如哀册、德音等,亦即制诰类文章。这也是“燕许大手笔”一词产生之初的含义。苏颋与张说是初盛唐之交最重要的诏敕起草者,其时朝廷的重要文书几乎皆出二人之手。二人在诏敕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世人公认,皇甫湜在《谕业》中评价说:“燕公之文,如榱木桷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许公之文,如应钟鞞鼓,笙簧鏦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明神,享宗庙。”^[2]卷687,7册,7035可见对两人诏敕作品的推崇。不过,两人保存至今的诏敕文书,苏颋要远多于张说。据《全唐文》统计,苏颋起草的诏敕现存210多篇,而张说的诏敕几乎无存,《四库全书总目》分析《张燕公集》的流传时说:“《唐书·艺文志》载其集三十卷,今所传本止二十五卷,然自宋代以后,诸家著录并同,则其五卷之佚久矣。”^[3]卷149,张燕公集条,1279宋时所佚失的五卷,正好就是张说的制诏作品。因此,今天的我们如果想要感受“燕许大手笔”的风采,就只能从苏颋现存的诏敕中一窥究竟了。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阮爱东(1974—),男,湖南临湘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苏頌的诏敕创作,最显著的特征是骈散间用、融散入骈。

南朝以来,朝廷诏敕例用骈文。这一方面是因为骈文精美典雅,最能满足“王言”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是骈文自南朝兴起以后被广泛应用,不仅朝廷典册,就连公私文翰也多用此体。尽管贞观史臣早已认识到以骈文为代表的南朝文风的不足,但基于强大的文体惯性,骈文在李唐台建以后仍然大行其道。这是时代积习所致,所以高步瀛说:“唐初文体,沿六朝之习,虽以太宗之雄才,亦学庾子山为文,此一时风气使然,非关政治污隆。”^{[4]卷1,1133}直到张说、苏頌专掌制诰的初盛唐之交,诏敕中的骈偶成分才明显退潮。

苏頌现存的诏敕虽然还没有全篇皆散的作品,但部分作品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化骈为散,将散体文字应用于诏敕的叙事部分。《惠文太子哀册文》开头云:“维开元十四年、太岁景寅、四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太傅岐王薨于洛,册谥惠文太子,殡于正寝之西阶。仲夏景申,将祔于桥陵,礼也。”^{[5]卷32,130}这段叙述岐王李范去世将葬的文字,就全是散体。同样,苏頌起草的任官制敕,结尾的赏官、赐物部分往往也是散体,如《宋王成器太子太师制》的结尾:“可太子太师、雍州大都督,别加实封二千户,赐物五千段,絀马二千匹,奴婢十房,金银器皿二百事,甲第一区,良田三十顷,余如故。主者施行。”^{[5]卷35,151}苏頌起草的诏敕正文部分也有间用散体叙事者,如开元四年《睿宗遗诰》后半部分写睿宗交待身后之事云:“然朕顷感旧疾,歎焉大渐。圣贤共尔,修短其分。古无不歿,同谓之归。付托得人,夫复何恨。属纊之后,三日便殓。以日易月,行之自久。厚葬伤生,可以深诫。其丧纪及山陵制度,一依汉制故事。社稷务重,皇帝不可谅闇自居。小敛之后,宜即别处视事。军将及岳牧等所在发哀,并不须来赴。百辟公卿,孝子忠臣,送往事居,无违朕意。主者施行。”^{[5]卷12,73}这一段语重心长的嘱咐,也是非常自由的散体文。

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指出:“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6]贵用散行条,9册,8443}这说明,骈文中融入散体非常重要。他又说:“故(庾)子山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而骈俪之句则接于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如是则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6]骈散合一乃正格条,9册,8450}在孙氏看来,骈体文不能通篇运骈,而应该骈散相济,两者各有分工:叙事用散体,抒情、用典的时候用骈体。揆之苏頌的诏敕,孙氏之言可谓洞见。以《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5]卷4,21}为例,这篇制书的前半部分以长篇而整饬的骈文阐述改元之因,夸赞朝廷盛德,后半部分对薛伯阳、郭元振、崔涤等罪臣的具体处理意见则是骈散相间、以散为主,绝不以辞害意。对郭元振的处置意见全为散体:“郭元振往立大功,保护于朕。顷因阅武,颇失军容。责情放逐,将收后效,可饶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处置薛稷之子薛伯阳,则先以散体说明本应因其“凶魁之子”的身份而严惩但却网开一面的处置思路,再以两组骈句“旋念从夫之礼,深矜自我之出。宜复旧婚,再承新命”表明处置原因是念其妻凉国公主是玄宗的同胞姐妹。处置崔涤则正好相反,先以“先王之制”领起两组“罪不相及”的“故实”,工整的骈句之后,再以散句述崔涤与其兄崔湜“忠邪有判”,顺理成章地得出赏罚不同的结果,不但文气顺畅、说服力强,而且音声顿挫、缓急有度,更能见出盛世明君的胸怀。

总体来说,诏敕的行文如果全篇骈体容易使文章流于板滞,全篇散行又难昭示“王言”的典重雅致。苏頌的诏敕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叙事用散体,用典用骈体,因而兼具流畅与典雅。

苏頌的诏敕创作,第二个显著特征在于用典方面的变化。

用典是说理的利器。一个妥当的典故的运用,胜似一大篇说辞,正如《文心雕龙·事类》所说的那

样：“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更重要的是，用典能为文章增添典雅的味道：“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7]411} 诏敕的撰写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的硕学鸿儒，因此，他们经常在诏敕中使用典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苏頲诏敕中的用典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上文所述《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中对崔涤的处置意见：

朕闻罪不相及，先王之制。叔向岂坐于凶弟，展禽见称于哲兄。刘冀不以刘伟获辜，王导不以王敦废职。崔涤为其兄浞构祸，每进款诚。事朕有年，心则无隐。忠邪既判，赏罚宜均。俾践储卿，式彰臣节。可太子仆员外置同正员。^{[5]卷4,21}

“叔向岂坐于凶弟”意为叔向的贤名不会因为他的弟弟枉法断案而失色，典出《国语·晋语九》。“展禽见称于哲兄”事出《庄子·盗跖》，意为人们不会因为柳下惠的弟弟是盗跖而非议他。同理，刘冀不会因为刘伟而获罪，王导也不会因为堂兄王敦而去职。这里连用的四则事典，除刘冀、刘伟兄弟之事外，都是人所共知的“熟事”。

所谓“熟事”，是相对于“生事”而言，指常见的典故。宋人王銍在《四六话》中论骈文用典时说：“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则搜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6]卷1,1册,8}莫道才解释说：“‘伐山’比喻文章典故及用语是前人从未用过的，如同搜山寻求原木，这些材料对读者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在阅读过程中会有一些隔阂，故称作‘生事’；‘伐材’比喻前人用得较多的典故及用语，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故称作‘熟事’。”^{[8]189}简言之，熟事就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典故，生事即较为生僻的典故。熟事易于理解，几乎没有窒碍，但用无妨；而生事的使用，则往往会打断读者的思路，使文章流于艰涩。

苏頲的诏敕以使用熟事为主，他很少从犄角旮旯里拈出“生事”来炫才使气，以考验读者的才学。如《上开元神武皇帝册文》：“曩者景龙之末，长蛇纵祸，陛下虑宗社之堕，提剑而夷之，则因亲以尊主。间者朝有贼臣，天罚大憝，陛下拯邦家之难，援旗而剿之，则措枉以举直。戮不及嗣，恶惟其魁。思与王公卿士，下逮元元，扬闾择而育和气。臣又闻轩梦华胥，尧期姑射，未有一其道而顺太皇之心；文王昭事，武王缉熙，未有一其时而居圣神之位。”^{[2]卷254,3册,2575}提剑斩长蛇，用的是汉高祖斩白蛇之典。“措枉以举直”，概括《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句意。“轩梦华胥”化用《列子·黄帝》篇中黄帝（轩辕氏）“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故事。“尧期姑射”用《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事。“文王昭事，武王缉熙”则合用《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和《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意，谓勤勉、光明。这些典故对当时的士人来说也都算比较常见的“熟事”，易于理解。

类似的用典，还可以从《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苏頲起草的诏敕中再随意举出几例：

期问政于经始，载登贤于梦卜。（《刘幽求知军国大事制》）^{[5]卷44,218}

子产之道四，既取诸身；咎繇之德九，以成其用。（《刘幽求同三品制》）^{[5]卷44,218}

伯起慎于四知，尝得其真；叔敖谨于三者，故能深而不竭。（《张说中书令制》）^{[5]卷44,218}

朕之钦哉管乐，臣之杰者萧张。（《姚崇兼紫微令制》）^{[5]卷44,218}

第一例中，“问政于经始”语出《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梦卜”用周文王渭水出猎而得姜尚故实，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第二例中，“子产之道四”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咎繇之德九”语出《尚书·皋陶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第三例中，“伯起慎于四知”指《后汉书·杨震传》中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拒受故人王密

遗金之事。“叔敖谨于三者”典出《说苑·敬慎》，谓孙叔敖以楚老父“位已高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之三戒治楚。

第四例中，“管乐”指管仲、乐毅，“萧张”指萧何、张良，谓良臣。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苏颋的诏敕文书，的确主要以用“熟事”，对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唐廷官员来说，阅读起来基本没有障碍。这种用事方式，更易使文章达到“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文心雕龙·事类》）的表达效果。

三

苏颋的诏敕创作，第三个特征是骈对的形式和句法上的改变。

先说骈对的句法。骈体文又称“四六”，即其语句以四字、六字句式为主。苏颋的诏敕作品在句式方面灵活多变，以其《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5]卷4,21}为例，这篇制书单句有短至三字者，有长至八字者（仅指骈句，不含单体散行的句子）：

三三句：故能/稽昌历，考元符。

四四句：通于神祇，格于上下。

五五句：夫/循名者责实，谋始者虑终。

六六句：每□兢于紫座，宁自贵于黄屋。

七七句：叔向岂坐于凶弟，展禽见称于哲兄。

八八句：刘冀不以刘伟获辜，王导不以王敦废职。

两两对仗的句子中，骈对的形式就更加多样化了：

四四四四句：朕闻/圣人无心，同于吹万；上皇有道，契于明一。

四五四五句：始自朝廷，纳之以轨物；加于蛮貊，洎之以声教。

四七四七句：然/号以功成，则功不可以不表；归以德厚，则德不可以不励。

八六八六句：居天下之尊者□大，体其大以照临；成天下之务者至公，顺其公以康济。

以上所举还只是苏颋一篇诏书中的句式应用，若加上其他篇章，则句式变化会更为丰富。如《睿宗遗诰》：“虽创业垂统，则至公之器，固不可违；而居常待终，则必定之期，固不可易。”^{[5]卷12,73}这是以两个三句组成对仗。再如先天二年《开元神武皇帝册文》：“曩者景龙之末，长蛇纵祸，陛下虑宗社之坠，提剑夷之，则因亲以尊主；间者朝有贼臣，天罚大憝，陛下拯邦家之难，援旗剿之，则厝枉以举直。”^{[2]卷254,3册,2575}前五句记玄宗诛安乐公主事，后五句记玄宗诛太平公主事，两者虽然内容和句式大致整齐，但又未刻意对得工整，反而以非常罕见的长句使读者完全忘其为对。总之，多变的句式，使苏颋撰写的诏敕文书显得更为灵活多变、摇曳生姿。

再看苏颋诏敕作品的骈对句法。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指出：“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7]375-376}刘勰认为，四、六句式各有其特点，但作者也不能总在这个套路里转圈圈，而是应该辅以三字句、五字句，适当改变一下句子的节奏，以新人耳目。如何改变呢？刘勰在后面接着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以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7]376}也就是说，要想改变骈文的节奏，可以适当地在句首、句中、句末加入一些虚字。一个妥当运用的虚字，可使文章“得一字之助”，变得更为灵动多变，以消除骈文常有的板滞之病。

苏颋的诏敕在句法上虚字就用得特别好。《薛讷朔方道大总管制》云：“……薛讷，家代名将，国朝元老。知通泉源，气横风电。庙堂之上，则宽而有谋；旗鼓之间，则勇而无挠。”^{[5]卷59,316}前面用来介绍薛讷家世的两个四四骈句，均为实词，分别是2-2节奏和1-3节奏（家代/名将，国朝/元老。知/通泉源，

气/横风电),显得比较呆板。所以后面两个四五句式,则在四字句中加入“之”字,五字句中加入“而”字,变成了2-2、2-1-2节奏(庙堂/之上,则宽/而/有谋;旗鼓/之间,则勇/而/无挠),一下子便显得灵动起来了。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指出:“作骈文而全用排偶,文气易致窒塞。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使之动宕。”^[6]贵有虚字条,9册,8435说的就是在整齐的骈文句式适当加入虚词,以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

四

最后,苏颋的诏敕作品笔法雄健,与唐玄宗登基前后唐朝日益上升的国势互为表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气质。

玄宗继位前后,大唐人才辈出,尤其以张说、苏颋等为代表的既身居高位又能在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人,更是开一时之风气。这些人,葛晓音拈出一个现成的词——“文儒”,即“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者——为他们命名^[9]274-295。“文儒”既有文士的文采风流,又以儒家的礼乐为内核,注重儒士的人格修养,刚毅果决、勇于任事。这种新型士人,与太宗、高宗武后时期的朝廷官员完全不一样。唐太宗在位的中前期重儒轻文,厚重有余而文采不足;太宗后期到高宗、武后时期重文轻儒,文采有余而气节尽失。两者都不足以显现大唐帝国赫赫扬扬的气势。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文儒”综采礼乐与文学,借“大手笔”奏出盛世雅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刚健俊爽的气质出现在文学舞台上。《旧唐书·文苑传序》云:“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并非肆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10]卷190上,4982意思是说,以燕、许之“王言”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成就,并不完全是从学习中得来,而是秉承时代灵气,天机化成。张说的文章被唐玄宗赞为“精义探系表之微,英辞鼓天下之动”^[10]卷97,3056,虽然他的诏敕文几乎没有留存,但从其《开元正历握乾符颂》《封禅坛颂》《大唐封祀坛颂》等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散文作品不但说理雄辩、笔法雄健、文气贯注,而且节奏明快、音声流丽,部分作品甚至暗寓声律、允称佳构。苏颋的诏敕作品也是这样,其《上开元神武皇帝册文》《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睿宗遗诏》《焚珠玉锦绣敕》《惠文太子哀册文》等大制作,以雄健的笔法、雍容的气度、壮美的辞藻和明朗的格局,将六朝以来的绮丽纤弱一扫而空,其雍容华贵的独特气质,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擘开一条新路,被韩休赞为“发挥造化之微,鼓动江山之气”^[2]卷259,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3册,2987。时人、后人对张说、苏颋文风的评价非常接近,“英辞鼓动天下之动”“鼓动江山之气”之类的说法,昭示了他们在时代风气丕变之时巨大的引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苏颋与张说一起引导的散文领域的气质巨变发生在诗歌方面“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之前。这意味着,盛唐文学的声律风骨很有可能是先得之于散文,而后才从散文领域转移到诗歌领域。这并不是没有由来的猜测。王太阁在《论“燕许大手笔”》中指出,“燕许大手笔”的含义有三个明显的变化:它最早指张说、苏颋撰写的诏敕文书即散文作品,中唐时由散文作品转而指称作者,宋以后开始由指称作者转向指称他们的诗歌作品^[11]42。既然“燕许大手笔”这个词的内涵可以由散文领域转向诗歌领域,那么盛唐气象所蕴含的声律风骨也有可能由得风气之先的诏敕领域转移到诗歌领域。苏颋和张说以其高出同侪的“大手笔”引领初盛唐之交时期文学的巨变,同时他们又借助自己崇高的政治地位大力提拔文士,进一步推广他们得风气之先的文学理念。

总的来说,苏颋的“大手笔”制诏文书,与张说的作品一起,以健康爽朗的笔法,为初盛唐之交的文风、诗风擘出一条新路。其雄健的笔法、雍容的气度、壮美的辞藻和明朗的格局,既具风骨,又不乏声律,将六朝以来的绮丽纤弱一扫而空。他们的诏敕作品,在诗歌“声律、风骨始备”的开元十五年到来之前,率先在散文领域实现了声律、风骨的融合,为诗歌的发展导夫先路。后人对燕、许诗文的评价,往往准确地把他们放在文风转变的转捩节点予以论述,如刘麟生称燕、许之文“迨夫文治武功,发扬光大,为黄帝神明之胄,吐气扬辉,于是作风博大昌明,少趋典重,燕许作品最足以征其变”^[12]76,就是对“燕许大手

笔”在初盛唐诗风转换之时的先导作用的积极肯定。

[参 考 文 献]

- [1] [宋]欧阳修,宋祁,编.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6]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7] [南朝]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 莫道才.王铨骈文典故理论考说[J].文学遗产,2015(2).
- [9] 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C]//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0] [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 [12]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On the Imperial Edicts Writing of Su Ting

Ruan Aid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1331, China)

Abstract: Su Ti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afters of imperial edicts at the turn from the early to the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 His imperial edicts and Zhang Yue's imperial edicts were called "The Authoritative Articles Wrote by Duke of Yan & Duke of Xu". In the case of almost all of Zhang Yue's imperial edicts were lost, if we wants to see the elegance of "The Authoritative Articles Wrote by Duke of Yan & Duke of Xu", we can only read Su Ting's imperial edicts. After combing more than 210 imperial edicts written by Su Ting.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Su Ting's imperial edicts were alternate using prose and parallel prose, using familiar allusions, the antithesis were keep changing, and the edicts were powerful. In general, Su Ting's imperial edicts opened up a new road for the style of prose and poetic of Tang Dynasty. Before the fifteenth years of Kai Yuan was coming, the creative of Su Ting had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f prose to realize the rhythm and vigor of style, which was the guide for the arrival of the high literature tide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he Authoritative Articles Wrote by Duke of Yan & Duke of Xu; Su Ting; imperial edicts

[责任编辑:孟西]